本土歷史記憶與白族認同

王明珂
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

中文摘要

雲南滇洱一帶自古以來便為雲貴高原的文明與政治經濟中心，並深受中原、吐蕃與南傳佛教文化影響，因此有多元豐富的歷史記憶。自元滅大理，又經明清帝國統治，世居大理一帶鄉鎮間的“白人”大姓家族逐漸自稱“南京人”。這個研究以雲南白族為例，探討過去自稱“白人”、“民家”或“南京人”的洱海一帶村鎮人群成為今日“白族”的過程，包括此過程中過去的歷史記憶如何被保存在民間，地方知識份子如何蒐集與保存這些歷史記憶，如何詮釋這些歷史記憶。藉著這個案例，本子計劃希望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如何研究“民族”，本地知識分子對自身族群身份的認識與反思，以及我們如何解讀文本表徵（如漢化）下隱藏的情境與個人情感，提出一些反思性的新見解。

在民國肇造之初，中國為包含漢、滿、蒙、回、藏所謂五族共和之國家。然而識者皆知，當時此國族國家內尚有許多無法納入此五族的人群；他們究竟是何民族，以及是否應承認其為國族國家內的一“民族”，成為政學界一難題。當時最有“民族”爭議的是南方與西南邊疆。由於長期漢化效應，雲貴川桂等省都有相當多漢與非漢區分模糊的人群。即使能分辨漢與非漢族，這兒又有廣泛被稱為“苗”的人群，他們究竟是一個民族或多個民族仍不清楚。

在 1930-40 年代之交的中日戰爭前期，許多學者及學術機構遷於西南後方，有些學者因而趁便在川滇進行邊疆民族考察。然而此舉卻引起關心國事者之憂疑，激起一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大論戰；許多著名歷史學者與民族學人類學者，如傅斯年、顧頡剛、費孝通、翦伯贊、白壽彝等皆捲入其中[1]。掀起此論戰的傅斯年、顧頡剛等認為，在南方及西南邊疆進行民族研究因而識別一個個的“民族”，會減弱中國民族之團結，因而堅持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傅斯年更指出，雲南本地人多已同化於漢人，“概此等同化之人，本諱言其淵源，今

[1] 黃天華，〈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抗戰前後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一九四Ｏ年代的中國》（下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1044-1061，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

言之不已，輕則使人生氣，重則使之有分離漢人之意識，此何為者哉！”[2] 當時在雲南大理附近從事人類學考察的人類學家許烺光也得到同樣印象；他稱，當地（喜洲）人都說他們的祖源是漢人，而且對此很在意，若別人對此懷疑他們會很腦火，同時他們在生活習俗、家族與禮教觀念上也表現得比其他地方的漢人還要像漢人[3]。

以上這些爭議，涉及兩個彼此相關的問題：一、20 世紀上半葉以來的邊疆民族研究、識別，最終讓許多本地人成為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的“少數民族”，在此過程中是否相關學科（如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之學術法則、知識可以發現客觀事實，因而正確地識別各個民族，釐清各民族間的族群邊界？二、國家是否應尊重學術所發現的真實，承認內部各民族之存在與彼此區分？或者，國家應努力泯滅內部各民族之族群邊界，打造一體之國族？這兩個問題所涉及之學術與現實，不但在當時難以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至今仍有爭議。

今日之中國民族爭議主要是，許多研究都顯示 20 世紀上半葉的學術，因學科本身的偏見，或學者自身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偏見，而在民族分類、識別上有許多的錯誤與瑕疵，且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因此有些中國學者極力主張中國應大幅調整目前之民族政策，政治力退出“民族”，讓“民族”成為一文化性的族群認同與文化範疇[4]。許多中國之外的學者，從後現代學術之解構觀點，也指出中國民族分類、識別上的許多學術偏見與錯誤，並認為中國識別、界定各少數民族以施行其民族政策，實為對少數民族的掌控；有些西方學界、政界人士也因此同情或支持部份中國少數民族欲脫離中國的努力。然而絕大多數的中國學者及民族幹部，仍堅信當年之民族分類、識別大體無誤，相關的歷史、民族和語言知識仍被視為典範，因此他們對於國內外人士、團體欲改變當前中國民族政治現況（如各級政府中的民族委員會、各級人代會及黨政組織中的少數民族代表）與民族政策的主張十分不滿。以上這些爭議的焦點便是：我們應如何評價 20 世紀上半葉之學術下的民族調查、研究所建立的歷史與民族誌知識，以及因此產生的社會現實（中國少數民族之政治與文化現象）？以及相關的，學者如何（或是否宜於）以其學術研究成果訴諸現實關懷？因此這不僅涉及對 20 世紀上半葉學術（主要是歷史學與人類學）方法、知識之批判性探討，也涉及學者對自身學科知識與社會角色的反思。

我最近數年發表的文章皆涉及以上議題，並嘗試建立一套反思性研究分析體系。簡單地說，這是建立在歷史記憶、社會群體認同與文本、表徵分析上的一種反思性研究；從表徵與本相以及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係，來探索文本作者

---

[2]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傳記文學》1963年2卷5期，頁20。

[3] Francis L. K. Hsu,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49), 16-21.

[4] 參與本研究計劃之北京大學馬戎教授便是持此論的代表人物。

（或一社會現象的行動者）所存在的社會情境，及在此情境中其個人之情感、意圖與作為，並在人類生態體系（human ecology）及長程歷史中思考此社會情境及個人作為之意義。以上面提及的 1930-40 年代雲南人的例子來說，當時若一個雲南人穿著及一切言行都如漢人，也自稱漢人，別人對此質疑時他還會生氣，我們只須接受這樣的外在客觀“漢化”印象及人們主觀表述的認同？或者，我們可以深入了解這些雲南人隱藏的情感與意圖？

在過去的著作中，我曾以清代雲南人王崧在道光年間編雲南省誌之事為例，說明在政治情境（雲南為帝國之省）、組織機構（方志局）與書寫規範（方志文類）之層層掌控、導引下，王崧仍然寫出一個違反方志文類的雲南方志。王崧的家族當時自稱是南京上元里人，也就是漢裔。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便是這些隱藏的個人鄉土情感及相關情境，讓大理一帶的“南京人”後來終成為“白族”。這個子計劃便是上述研究的延續。

雲南滇洱（昆明、大理地區）自古以來便為雲貴高原的文明與政治經濟中心，並深受中原、吐蕃與南傳佛教文化影響，因此有多元豐富的歷史記憶。自元滅大理，又經明清帝國統治，世居大理至昆明一帶鄉鎮間的“白人”大姓家族（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本土歷史記憶逐漸消失，大多逐漸自稱 “南京人”。而且，在清代這些大姓家族之人由科舉進入仕途者眾，長於漢詩文書法者亦多。

清道光年間的 “南京人” 王崧，17 歲入鄉學，師從宿儒檀萃。48 歲中進士，此後便在山西當知縣，後來又在當地書院講學，直到約 68 歲才返回雲南。不久，道光六年（1826）阮元在雲南主政（時阮為雲貴總督），籌畫編纂新的雲南通志。王崧此時已是非常受崇敬的本地學者，又與阮元有舊，因此受延聘入雲南省志局任總纂之職。已編成七志後，他因與巡撫伊裡布以及其他編纂者不合，憤而攜稿離去。後來此稿為其同裡杜允中，於 1829 年在大理以《道光雲南志鈔》之名刊刻出版。在此著作中，作者表現其既接受華夏典範歷史，又難捨本土歷史記憶之情懷。如在描述雲南省時，他稱：「雲南府為省會，東北至京師八千二百里。其地當唐虞為南交、昧穀之交，夏、商為梁州徼外……戰國時，楚莊蹻略地西至滇池，歸報道絕，自王其地」[5]；這是將本地納入華夏空間與歷史之中。他稱，「楚、蜀、滇、黔，于古為西南外徼，荒誕之事尤多」；他舉蠶叢、杜宇、竹王，以及高辛氏與槃瓠等故事為例，並稱「蠻夷之王侯君長，其興也大率類此」[6]。看來是接受典範之華夏中心觀點，將滇視為蠻夷之域。然而在他所舉的「荒誕」例子中，卻無沙壹、九隆、阿育王之子等故事。這是因為，他不但未將這些本地傳說視為「荒誕之事」，並還將它們寫入本書的「世家」篇。

---

[5] 王崧，《道光雲南志鈔》，收於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十一卷，頁 406。

[6] 同前，頁 476。

王崧在此著作中稱，他「爰稽正史，參以雜說，取其近是者述為世家」。他的確是依循此原則，採各種本土著作所載史事，編入《史記》、《後漢書》等典籍之敘事，彙集成本書各篇「世家」。其中，第一則便是〈滇世家〉。文稱：「滇王者，故楚將軍莊蹻之後也。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為大盜，一頃襄王時為將軍。為將軍者，其後稱王於滇」[7]。在此書寫中，作者刻意釐清此「莊蹻」並非楚之大盜「莊蹻」。「世家」篇中還有〈夜郎世家〉、〈白蠻世家〉、〈九隆世家〉等。「世家」是出現在正史《史記》中的一種文類，在明清方志中出現「世家」是相當罕見的。由此亦可見王崧在本土認同下，以及在華夏與滇二者之敘事文化中，不只選擇材料以組成文本，更選擇特定文類來表述這些歷史記憶。這些不合典範的方志內容與文類，可能是王崧不能見容於其他編纂者的部分原因。然而在他離開省志局後，此書稿幾乎立刻便在大理刊行。此表示王崧及其鄉親不願此書稿之論述受壓抑、掩沒，也表示其論述在大理能得到一定的欣賞與支持。如雲南大理著名文人趙聯元父子，便對王崧十分同情。趙藩在其《續雲南備徵志序》中，引其父趙聯元之言稱：「巡撫伊里布公，不學人也。分纂黃岩、李誠駁雜而堅僻，每與樂山（王崧）齟吾，巡撫復右之……。」並稱，在王崧離去後，李誠於王崧原稿多所竄改[8]。

王崧在編雲南省志時做了一件更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他乘機廣徵雲南各方遺書，編成《雲南備征志》，因而使許多本土歷史記憶得到保存。後來此叢書由清末至於中共建國後一再增編，從事者之一便是前述大理附近的劍川人趙藩。趙藩曾在晚清時任官四川，因同情革命黨人而辭官歸里。民國成立後他又幾度參與全國性政事，皆不合其志，1920 年他回滇任雲南省圖書館館長，從此潛心於著述及史料編纂工作。他延續王崧之史料編纂工作所編的《續雲南備征志》、《雲南叢書》等，混合著中國文史資料中關於西南的記載以及本地史料，成為建構“雲南人”及“白族”認同最重要的社會記憶庫，也是讓滇洱“南京人”、“白人”後來成為“白族”的關鍵。

這個研究計劃之目的是探討雲南大理一帶 “白人”、“民家”、“南京人”，經 20 世紀前六十年之民族調查、研究與識別，終成為白族的經過。特別是，一，自南詔、大理國時期以來蘊積的社會歷史記憶，如何被保存在民間日常生活之中；二，這些保存在民間故事、宗教活動中的歷史記憶，如何被外來者理解為神話傳說而被邊緣化；三，由清中葉以來，大理附近士人王崧、趙藩等接續編纂一系列雲南地方歷史文獻——《雲南備征志》、《續雲南備征志》、《雲南叢書》——時，如何將載有這些民間傳說的文本納入所編叢書之中；四，這些保存在民間及當地士人所編叢書中的歷史記憶，後來如何讓許多滇洱一帶的 “白人”、“民家”、“南京人” 成為白族。

---

[7] 同前，頁 479。

[8] 引自於《道光雲南志鈔》「概說」，見《雲南史料叢刊》第十一卷，頁 405。

此子計劃之研究對象是被認為早已“漢化”之白族，研究對象人物如趙藩等並非努力爭取本民族文化與身份認同的知識份子（如苗族之梁聚伍、石啟貴等），甚至他們並未有清晰的“白族”認同。然而透過對這些世居大理附近的士人之研究，此研究計劃所涉之重要議題為：（一）由明代以來，承自南詔、大理之本地“歷史” 如何被寓居雲南的中原士人視為 “神話”，以及當代白族又如何將這些 “神話”再詮釋為 “歷史”，以及此過程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二）在國家治理與種種社會“結構”之掌控或影響下，個人潛藏的鄉土情感、意圖如何影響其書寫與社會活動，而這些書寫與社會活動對各種“結構”有依從也有違逆；（三）我們如何觀察、閱讀而認識 “神話”、“歷史”與人們之言談作為中潛藏的情感、意圖與認同情境。

本子計劃的重要性在於，研究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歷史學者傾向於說明在西方傳來的國族主義及相關的民族、國民等概念下，中國政、學界菁英如何在思想、政治、經濟、民族等各層面建構新的國族國家，包括建構國族國家邊緣的少數民族。中國各地非漢人群，無論是蒙、藏或西南各族群，似乎皆在這樣的潮流下無力與之對抗，而成為中國與中華民族內的少數民族。這一類的歷史研究，極少論及各中國邊疆族群之社會文化——如人類學知識所建構——如何影響人們對這些外來思想與政治潮流之理解，以及其對一些新概念、新知識的接受與回應。研究中國當代少數民族的人類學者，則或傾向於重建近代變遷前各族群之傳統社會文化，或描述在當代中國政治影響下，其傳統文化被壞、改變後的現況，以及因應其少數民族身份的文化建構、展演，和與國家政權之間的互動。這一類的人類學研究，關注的是“過去”（或傳統）非漢族群社會文化，以及“現在”的少數民族社會文化，也很少注意近代思想與政治潮流——如歷史學知識之建構——如何造成土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藉著近代“白族”之案例，本子計劃探討的便是，清中葉到民國初期大理附近“白人”、“民家”、“南京人”民間社會文化，以及本地士族家庭之經史教育，如何創造出如王崧與趙藩這樣的知識份子；而王崧與趙藩這樣有帝國與當代國家視野與新知的知識份子，又如何透過與鄉土士人的互動，影響本地人的認同。